

共产国际 和中国共产党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周文琪 褚良如编著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中央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
国防大学印刷厂 承印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351千字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丛书编号：7—2 成本费：2.70元

印数：1—3000

党校内部发行

关于编印《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的说明

编印《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的目的，在于为各级党校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资料，以促进党校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凡是党校工作人员编写译述的资料、试用教材、译作、专著，具有相当参考价值而不宜公开发行者，均在编选之列。希望广大党校工作者给以支持和批评，帮助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使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党校教育正规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出版前言

马克思在一封寄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回顾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风云，这种类似古生物学中的状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认识，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的关系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分析这种进展的原因，最根本的当然应首推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另外，也许不无关系的是，在这个领域里所研究的问题，距离目前毕竟已有五六十年，在资料的选择和理论探讨中，既不会触及什么敏感的问题，也就用不着顾虑什么了。而较近期的研究便不同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虽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作出了很多精辟的论断和中肯的结论，可是，进一步具体的具有相当深度的探讨研究却不很多见，这是为什么？

固然，不正视近几年来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进展是不正确、不公平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缺乏历史感的表现。由于冲决了“左”的指导思想的禁锢，突破了许多长期被列为禁区的领域，我国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在这几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只要对比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年内的理论界那种混乱、贫乏、迷茫的状况，便足以为我们今天的成就感到自豪了。而当我们深入学习研究最近举

AWT1/36/01

行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时，更不难看出这里凝结着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许多新的成果。然而同一日千里的经济发展和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比较起来，理论的进展却有些相形见绌。在这个问题上，责难理论工作者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主要还不是理论工作者主观上不努力。有人认为，这几年在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上，总有一股可以感知而无法名状的“左”的潜势力，若明若暗、时隐时显地威胁着、阻碍着理论和学术的繁荣。这种看法不无道理。看来，要做到使理论工作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开创理论工作新局面，首先就必须严肃对待“左”的指导思想的残余。

这种残余既有伪装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又同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溶合一体，成为一种看来几乎是无法突破的障碍。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实行釜底抽薪一法：一方面，切实地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彻底地批判封建主义观念，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唯权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清除“左”的残余所借以保持其影响和作用的形式和手段，为理论研究开辟自由的广阔的天地。我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封建主义方面越是有功，越有成绩，我们理论研究的道路也就越发宽广。这条道路应当由理论工作者自己来争取、来开拓；既不能乞求他人的恩赐，也不应坐待历史的垂怜。

这将是困难的，然而又是一切正直的理论工作者所无法回避和义不容辞的。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编选组

1985年10月1日

编者的话

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它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弄清这个问题，就不能深刻地全面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理解党今天制定的对外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内容极其丰富的问题，当然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但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目前还处在发掘、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中。我们掌握材料不够，更研究得不深。这个本子，只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这个专题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指导下写出来的。另外整理了一个纪事，它力求按时间顺序排列，又按事件和问题适当集中叙述，试图既反映共产国际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直至共产国际解散的全过程；也反映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但所收资料肯定地说是很不完整的，有待于将来继续补充、提高。只是希望它能对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提供一些研究线索。为了便于研究方便，我们还整理了一个“参考文献和书目”附在书后。在这些工作中，错误和遗漏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较多地参考和利用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有关资料；在书稿完成后，承廖盖隆同志在百忙中审阅和修改，特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周文琪 褚良如

1985年5月

目 录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1)
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2)
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10)
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18)
四、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37)
一九一九——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45)
一九二九——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63)
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	
——毛泽东策略思想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具体运用.....	(73)
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国国情相结合.....	(87)

附一:

共产国际和苏联同中国共产党关系大事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107)
--	---------

附二:

参考文献和书目	(384)
(一)参考文献	(384)
(二)参考书目	(419)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从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正式成立，到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为止，共存在二十四年零两个多月。

从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直到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路线正确与否，革命斗争的成功或挫折，和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因此，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条中提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第二十八条又提到：

“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里，扼要地谈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有给了帮助的一面，也有给了损害的一面，但是，这又告诉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问题。

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一)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影响。维经斯基、马林等先后来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五四运动,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基础上,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的《提纲》及大会通过的其他有关文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其主要思想是: 1、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结成亲密的联盟; 2、共产国际必须帮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建立新型的政党; 3、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 4、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但不能同他们“混为一体”,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5、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些光辉思想,指出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因而极大地援助了中国革命。列宁起草并为大会通过的其他一些文件,还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政

治原则、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为各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党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列宁的建党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即一九二〇年四月间，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中国。维经斯基的中国名字叫吴廷康。他在十月革命前是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一九一三年去美国并在美国加入社会党。一九一八年春回到俄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加入共产党。在高尔察克反革命叛乱期间，他从事地下活动，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起义。粉碎白匪军以后，他又重新回到海参崴。那里的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被捕并被流放到萨哈林岛（库页岛）做苦役。推翻白匪政权后，一九二〇年一月间他被释放出狱。由于他有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和通晓英语，五月间被共产国际远东局派来中国。和他一道来的有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人员马迈耶夫等。他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会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他到中国后，首先通过北大的俄籍教授柏烈威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然后经李大钊的介绍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他曾向陈独秀表示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的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能够很快地联合起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将予以支持。在此期间，他还会见过孙中山。

大约在一九二一年春，维经斯基回俄国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在中国初步活动的结果。嗣后他被留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秘书，负责处理远东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一九二一年六月间，荷兰人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同月到达上海。和他同时在上海的还有接替维经斯基的另一个共产国际代表（属伊尔库次克局）尼科尔斯基。马林原名斯尼弗莱特，原是荷兰铁路工人，当过铁路工会的干部，入党后由荷共派到印尼搞工人运动，并参加了印尼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是远东的第一个马列主义组织。在此期间他还使印尼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参加到印尼的民族主义组织伊斯兰教同盟中，结成民族反帝统一战线。一九二〇年他作为这个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被派在民族殖民地事务委员会任秘书（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列宁），参预制定国际民族殖民地政策。由于列宁的推荐，他成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

马林到达上海后，和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一大的李汉俊、李达、张国焘等有所接触，并对如何制定党的纲领问题提出过意见，但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一大召开的前期没有请他参加会议，后期才请他参加了。就在他参加会议的当天晚上，与会者围坐在李汉俊家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法国巡捕房的密探突然闯了进来，但转身又走了。马林十分机警，建议立即停止会议，所有人马上离开。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首先走了。会议转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召开。马林参加了一大，但没有能表达他的见解。

总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一九二二年一月，为了与帝国主义的华盛顿会议相对抗，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具体纲领和建立统一战线策略思想方面起了巨大影响。

一九二一年十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通知，要中国、朝鲜和日本派代表参加的苏联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亲自去找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进行联系，国民党决定派出一名代表（张秋白）参加这次大会。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除中国外，还有朝鲜、日本、蒙古以及其他远东国家的代表团。中国代表团有三十人左右。代表中既有中共代表，也有国民党代表；既有工、农代表，也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在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团的张国焘和产业工人代表邓培以及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等。列宁除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无限光明的前途外，着重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勉励中国工人团结其他革命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前进。列宁还询问了国民党代表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

大会开了一个星期。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揭露了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所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的罪恶，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当前最大的敌人，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在俄国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大会着重地研究了中国问题，认为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前的革命任务就是要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和独立”，就是要反帝反封建。为了完成这一革命任务，大会号召建立国际的和国内的统一战线，并进一步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大会的这些内容，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是非常新鲜的。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还没有来得及学习，大家都知道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怎样达到这一目标，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要经过什么道路，很多人是不清楚的。一九二一年七月《共产党》月刊提出反对中国的政客军阀，想把反帝和反封建结合在一起“毕其功于一役”，但不是把这些作为党的纲领提出来的。经过这次会议的启发，中国共产党才开始了解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经过民主革命的阶段。民主革命的

任务就是要反对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军阀制度和封建土地制度。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一部分代表不久回到祖国把大会的成就报告中共中央。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七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就是在这次大会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两个文件和一大党纲比较，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方面进了一步。

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联系到当时的形势，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喧嚣一时的“武力统一”、“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各种反动政治主张，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多年来和军阀妥协的错误，明确指出：解决中国混乱政局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党在这个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个作为革命目标的民主纲领。

二大宣言进一步根据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根据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共产主义纲领和民主革命的纲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彻底的革命纲领。这个纲领，有效地动员了广大人民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在二大宣言里还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

和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相适应，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也给中共以巨大影响。

在这次大会召开前，中共很多党员，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中的民主势力是估计不足的，甚至存在着讨厌情绪。在这次会议上，中共的代表和国民党的代表在一起开会，一起讨论了有关民主革命的问题。在大会的影响下，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具体地提出了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

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这个文件的缺点是没有把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作用表达出来。中共二大宣言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内容主要是把孙中山为首的民主势力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并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次革命的理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具体怎么办，二大决议案很含糊，共产国际也不可能具有具体指示。

（三）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促进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项战略决策。

共产国际从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三次代表大会起，根据列宁的思想，不止一次地研究了制订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列宁在第三次大会所作的报告中阐述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巨大意义。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共产国际制订了统一战线提纲（《十二月提纲》）。一九二二年二月，共产国际第一次扩大执委会进一步指出《十二月提纲》是正确的。“在运用这种策略时，要和各个国家的条件相适应”。具体到中国来说，共产国际曾经有过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的方针，但最后的一项战略决策是要建立在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因此，维经斯基在中国不仅促进建党，而且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询问了苏俄和布尔什维克革命问题，要求建立电台联系并希望得到军事援助。这是共产国际同孙中山的第一次接触。

一九二一年六月间，马林接替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十二月

间，他带着翻译张太雷从上海到桂林和孙中山见面，“就承认和联合苏俄的可能性问题进行过三次长谈”。孙中山表示只有在他的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他才能公开和俄国结盟。马林从桂林又到广州，正好遇上香港海员大罢工，他亲眼看到国民党支持罢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拥护国民党等情况，更对国民党具有好感。他认为孙中山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因此，他回到上海后，竭力主张共产党应当放弃对国民党的不介入态度，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但在活动中共产党不能放弃它的独立性。马林这个主张为党内多数人所反对，于是马林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离开上海回苏联。

除马林外，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根据苏俄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谈判的特派代表裴克思的指示，也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下旬到广州和孙中山直接接触。他的任务是要搞清孙中山的内外政策，孙中山对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他的近期计划和国民党作为一个积极因素在广州政府的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在达林和孙中山的谈判中，也谈到了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在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的情况下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这个主张遭到张国焘等人的反对。

一九二二年八月间，马林从苏联再次来到上海的时候，正是中共二大闭幕后不久，他批评了“联合战线”的政纲。他说孙中山不会赞成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去。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这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但他的意见，仍旧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于是在他提议下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共中央杭州（西湖）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一步具体实施二大规定的“联合战线”。在西湖会议闭幕后不几天，孙中山因陈炯明的叛变从广州到达上海。这时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等分别去拜访了孙中山，他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刘仁静在会上发言指出：“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大前提，势须形成一个反帝的联合战线，因此本党（中共）决定与国民党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我们是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并以个人资格参加党……”。

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同年五月，在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中，又特别强调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封建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

同年六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在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说：“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一九二三年九月，苏俄政府派鲍罗廷来华，被孙中山聘为政治顾问，有力地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改组会议，发表了改组宣言，并指定专人和鲍罗廷办理改组事宜。这样，全面改组国民党，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就日益接近成熟了。